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一十四期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编者的话： 本文是胡耀邦外放陕西主政时的一篇讲话。时值社教中期，毛刘关于运动性质之争在“二十三条”里已经表面化，毛以“两条路线斗争”、“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否定了刘“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的判断，并开始纠刘之“偏”。而陕西，恰是刘少奇掌控之西北局辖地，胡耀邦的履新其实就是履险。

自“桃园经验”以后，面向基层的四清运动日益严酷，西北局更是变本加厉，左风劲吹，百业萧条，人人自危。对这样的局面，胡耀邦既要有所作为，又不能全盘推翻，只好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得饶人处且饶人。不唯如此，还要时不时把毛的话祭出来助阵。

在当时的背景下，做到这些，已属不易。十几年来，执政者疲民殃民运动不断，苛是常态，宽是例外。四清运动，从根本上说，是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的整肃，无论目标向上或向下，都是又一轮的苛政。非但不能缓解，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胡耀邦显然没有扭转乾坤之力。

即便如此，陕西的干部群众依然感念胡耀邦——一个胸无城府、与人为善之人，一个体察民瘼、实事求是之人。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施行了善政，松绑减压，化解戾气，解放干部，与民休息，恢复生产……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捅了马蜂窝：“解放干部”不就是要翻案吗？你若是对的，那整人的人不就错了吗？进而言之，四清运动不就错了吗？“与民休息”和阶级斗争背道而驰，“恢复生产”与“民主革命补课”也不相符。胡耀邦的所作所为，未

得毛刘任何一方的“中央精神”精髓，哪边都靠不上。更何况这是在别人的地盘上，怎么能容你这么横插一杠子？

结果是干一百天事，挨一百天整。直整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好在有人救驾，才捡回了一条命。对比后来那次“生活会”又是何其相似！

胡耀邦这次外放陕西，有人认为是功绩，有人认为是前科，这且不论，就说他这次陕西的“百日维新”和改革开放后的主持新政，倒是有线索可寻，且一以贯之的。至于两次的结果，要说是命，那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而是这个党的命，这个国家的命。

时至今日，似可认清“四清”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都已证明“左”的暴政的根子，并非只是认识上的“指导思想”，否则，只要“右”一点即可摆平。耀邦在“四清”中做了，而且在“改革开放”中做得更卓有成效，但最终都功亏一篑，连命都搭进去了。历史说明，“左”的暴政的根子应在于体制。只有改制——铲除专制体制，建立宪政民主政治，才是沧桑正道。

胡耀邦在陕西省委的一次讲话 (1965.1.22)

(注：本文是时任代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胡耀邦，在陕西省委工作会开始时的讲话。)

守一同志让我提前讲一点问题，昨天晚上想了一下，加班加点想了一下，有些问题没有想清楚，来不及和常委同志商量，因此，只能讲个人的意见。

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一个时期对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看法，点上也好，面上也好。第二个问题，要把我们的一切工作搞得更好，最根本的一环是什么？就讲这么两条。

一、对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看法

对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全面的看，要有一个根本的看法，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

的，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既不要肯定一切，又不要否定一切，不要绝对化。还是文件上的八个大字：“肯定成绩，克服缺点”。这个办法就是一分为二。毛主席号召我们，对一切事物，都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我看，我们对这一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究竟成绩大还是缺点大？还是毛主席几年来经常讲的：就全党来讲，任何时候，我们的成绩都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二十三条”是这么说的：“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全党执行了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于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努力，我国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军事战线上，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近几个月来，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城乡基层单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所以我讲，全党全国来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有成绩的，成绩是主要的。

我们陕西前线的情况如何呢？我的意见，成绩也是主要的。我很注意榆林专区同志的意见，米脂、吴堡、神木的同志说：“当前的形势很好，歪风邪气下降，正气上升，单干风基本上煞住了。传达贯彻中央五月工作会议精神以后，干部革命积极性有了提高；秋冬的生产劲头大，征购任务完成得好。吴堡县反映有几个公社一个秋冬完成了全年的农田基本建设任务，有的队现在还在打坝，农村的业余学习，文化活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成绩他们是充分肯定了的。大概别的组也把成绩充分肯定了。肖纯同志给了我一个材料，对前一段工作的估价，成绩很大，归纳成六条：第一，初步发动了群众；第二，涌现了一批骨干力量；第三，发现了不少问题；第四，解决了一批问题；第五，抓了生产，促了生产；第六，锻炼了一批干部。关中运输公司，去年第一季度亏损了二十七万，社教以来，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两个月不仅弥补了以前的亏损，年终还上交利润五十八万元。这一条，我的意见，要大表扬。不是说将功补过？（守一同志：报纸登第一版。）登第一版。过补了还有余了，把过补了还超过了，那还不登第一版哪？还有八八四厂，建厂以来年年没有完成任务，去年前三季度也没有完成任务，十月开展社教后，经过工作组发动广大职工抓生产，一个季度完成了全年计划百分之三十以上，从而第一次完成了全年计划。今年元月产品、产值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又作了开门红。没有搞加班加点吧？可要注意哟。（守一同志：这可以充分看出社教的威力。）成绩我觉得讲够有好处，成绩是主要的。成绩是哪里来的？一条是中央的既定的方针政策。第二条是西北局的领导督促、帮助。第三条是大多数干部坚决积极响应中央搞社会主义教育这个号召。我说这么讲好，因为可以鼓舞广大干部，可以肯定广大干部、广大积极分子干革命的积极性。就全省来讲，这个成绩要充分肯定。这是一分法。

另一分法，有没有缺点？我说肯定有，这是实际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有些地方可能大些、多些，有些地方可能小些、少些，要作具体分析。全省来讲，我的意见是这么两句话：“实际工作上有点缺点，思想上的缺点大于实际工作上的缺点。”实际工作上产生的缺点有哪几条或者叫主要有哪几条？我没有想清楚。我的意见，请大家摆一下，有啥说啥，归纳清楚，我觉得有好处。有的同志把大家意见初步归纳起来有五个（就是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受到了损失的）：第一个“双开”，“双开”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急了一些，多了一些，有些可能重了。我们是六百六十三（有人说：六百六十五），六百六十三哪六百六十五？这是一条。第二是矛盾上交多了一点。就是打击坏人四千二百多，可能里面有些可抓可不抓的，特别是抓了一百六十多个干部、教员，还抓了三百多职工，两项一共四百多，主要的是去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抓的。因此，矛盾上交的多了一点。第三是点上、面上（包括面上夺权的地区）斗争的面、打击的面偏严、偏宽，有些地方有点乱。我很注意刘端芬同志（省委宣传部长）关于文教部门的发言（咸阳组的第二号公报），讲了很多中学的小学的问题。文化部门要搞文化，搞“武化”太多了不行。文化部门那么集中，那么敏感，青年人又多，这

个材料值得注意。希望各组再看看这个材料，我不好念。现在地富出身的学生很孤立，“小地主”、“小富农”也叫起来了。有好几个县，还提出在学校各个组织中树立贫下中农学生绝对优势。华县一个女学生来信说，省上有位处长把她软禁了三天，逼她承认乱搞两性关系。你又没有看见人家搞两性关系，你把人家软禁起来，你犯法嘛，你违反宪法，私自捕人，私设公堂。怎么能这么干？同志们，苏三起解那个沈雁林都不敢这么搞嘛，他还要勾结县长干嘛，我们有些人可以私设公堂，那是达赖的办法，达赖是个官嘛。这个不行，这样要搞乱的。我讲的很严了，但是他已经搞了，你们区别一下，也不要搞得他们又紧张。现在这个话也很难讲喽，轻不得，重不得。第四条，贫下中农开会，要求贫下中农代表要求得很不适当，对广大群众伤了感情。第五条，由于我们发动群众不够，政策交代得不好，还死了一点人，多死了一点人。完全一个都不死，恐怕困难喽，我的意思是死的多了一点，我们全省死了两百多吧，（守一同志：点上）面上呢？（守一同志：面上没有统计起来）合起来有没有三百呀？（守一同志：有）三百，多了，两百也多了，一百也多了。同志们，死人这个问题我们要注意一下。他命都不要了嘛，表示他绝望了。主席为什么讲给出路呢？“给出路”那三个字讲得好，如果人相信他有出路，人们会给他出路，他就不会死了。把面上也统计一下。我觉得实际损失还不算大，因为就是这五个数字嘛，死三百，开除六百，捉了四千，斗的面多宽？可能也有千把了，还有，贫下中农伤了感情的可能也有几千喽，恐怕三四千，心中有数，就是那五个数。我们是两千零七十万，所以，实际上损失不算大，现在还不算大，这个估计恰不恰当？好在我们搞的面小，后来还收缩了一下子，还有些地方还没有开始动手，剑拔出来了，拔剑张弩，还没有开始交锋。

但是，思想上的偏差，我觉得大于实际工作上的偏差。再进一层分析，思想的偏差是什么？我看主要是两句话：叫出现了一种认为大多数干部不好，都要换，都要斗；大多数工人和贫下中农不能依靠，或者叫实际上不能依靠。一个群众，一个干部。这种想法，我说是很危险的想法。这种想法，如果再发展下去，发展几个月，或者三个月、半年，我们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偏差。我们实际工作中，就可能采取一个冒险政策。冒险，也是主席过去讲过的话，产生冒险政策，可能使大好形势受到严重的挫折。我想，如果发展下去，要脱离群众，要引起混乱，就要使大好形势受到挫折。所以，有些同志有忧虑，（守一同志：忧虑——担心）有些同志看出这个问题来了，我说是对了，是不能责备的了，他想事情嘛，他开了脑筋嘛。那么，正是在这么个关头，毛主席，毛主席他早就看出来，他为了打通大家的思想、老是不放大家走就是了。他开始第一次讲话，第一天（就是十二月十四号）就提这个问题。说是不是一手发动群众，一手教育干部啊！许多高级干部没有听他那一套。因此开这次工作会议一步一步打通我们的思想，开了一个月，一次比一次严。同志们，主席英明伟大呀！在关键的时候，实际工作上已经出了点偏差但还没有出现大偏差的时候，就来教育我们。我看这也是主席的领导艺术。在实际工作中，你们尝到一点苦头，但是又没有出大的偏差，赶快开会，这是最好的教育人的办法，最有说服力。所以，我们不要埋怨，将来我们一想，晓得我们这一段还有缺点，还有危险性，对我们许多好干部有教育作用。有两面的经验，有正面的经验，有反面的经验。这反面经验，在一定的意义上讲，那是很有说服力的。主席英明在这个地方。针对性我看也在这个地方，就是要防止“左”。同志们讨论时不是说“二十三条”有伟大的意义吗？我看也在这个地方。昨天，中央决定，“二十三条”采取印成布告的办法，每个支部两份。“面上的工作指示”就不会要了的。昨天，我们副秘书长连夜就印，大号字派排（守一同志：每一个大村子都可以贴到）公开贴嘛，怕什么。你不是讲放手发动群众嘛，依靠群众大多数嘛？你们又不依靠啦，你那个理论和实际连不起来。这个办法好啊！

同志们，肯定成绩，指出缺点，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为了泄气，目的是为了我们坚决而清醒地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健康地发展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就是“二十三条”上讲的：“肯定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以便取得更大的胜利。”

我们省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上，产生这么多缺点，特别是思想上产生这么多缺点？我说也是两分法，一个是我们坚决积极是好的，头脑不够清醒是不好的。形象的说法，我们坚决是够了，清醒是不够，坚决有余，清醒不足。主席经常告诉我们，不但要有坚决的革命精神，而且要有清醒的头脑，就是要有科学分析，做冷静的促进派。这个话，我们现在看起来很重要。我把你们催得紧，催得急，你们就挡不住，不敢挡。我的意见，现在要抓住一个标兵，抓住延安的雷德盈。他讲了两句话，他不同意延安前几年社教基本上打了败仗的提法，不同意以反右为纲。这个话是对的。我说因为他讲了这两句话，我们这次会议要树立这个榜样。同志们，这个好啊，在这个风头上敢讲这两句话，不容易。一九六二年，大家都讲一片黑暗的时候，只有军队罗瑞卿、韩先楚、杨得志、许世友讲了不同意见。我听主席那个话听了十几遍了，他抓住这个重要关头表扬他们几个人。我说这个责任不怪你们。因此，我同意澜涛同志讲的，这个时期发生的缺点，下面不要检讨，由西北局、省委负。（赵守一同志：主要是省委的责任）绝对不要层层检讨，由西北局、省委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因为我们指导思想，一个时候不大清醒，你们挡不住嘛，你们也不敢挡嘛！但是，我也希望你们对省委也两分法，一个还是坚决革命的，还有几个暂停，不管怎么样，我看还是对的。抓人上除了现行犯以外，暂停一下；夺权暂停一下；“双开”停下来。还要说一下，现在集中训练的人，不要虐待他们。“二十三条”给他们看，让他们讨论，不要搞成监视，不要当犯人看。如果我们交代了你们没有办，将来我们可要抓你们的辫子哟。年假要照例给他们放假回家。怕什么呢？我们对康泽就放假嘛。（守一同志：春节给他们放假，“二十三条”给他们看）其中有情节不同，有些还没有查清楚。就是犯了错误，你放假让他们和老婆、孩子团圆，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老婆、孩子的问题嘛！“啊哟！妈妈，我爸爸为什么不回来过年呀？”他妈妈说：“你爸爸呀，那些革命积极分子不许他回来呀！”这就把孩子得罪了。比如他有一个老太太七十岁，过年的时候会问：“我那个娃娃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我啊？”她媳妇告诉她：“你的儿子犯了错误了。”“犯错误不好，承认嘛！为什么不回来看看我呀？”你看看谁都不同情，人民不同情，老太婆不同情，娃娃不同情。同志们，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允许美国战犯家属来探亲，还给他住北京饭店。这是他家属的问题，不是他本人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要想清楚，有付清醒的头脑。（薛焰同志：机关干部过年不要回到社教的地区去，这一条是不是也开禁？）取消。机关干部过年不要回到社教地区去，这一条要取消。我们到处搞隔离，我们把他搞得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什么大好形势，一手大好形势，一手凄凄惨惨。哎，我讲得过分了，我是说必须纠正这个办法，这种办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为什么我们思想上发生这么一些偏差？有些同志说，我们有片面性，有些同志讲，我们不敢说、不敢顶。我看情况不一样。片面性这个东西是难免的，你说我们这些同志完全没有片面性？我这个人的片面性很多，今天的话里就有很大的片面性。片面性也有大、中、小之分。你说不敢说？你说说了一定挨斗？我看也不一定。你说在省委挨斗，你写到主席那里去，可能把你表扬。我说，我们避免犯比较长期的、比较大的片面性。办法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片面性犯得比较大呢？两三个月还不觉悟呢？三四个月还不觉悟呢？或者一年还不觉悟呢？根本原因，没有吃透两头，一头吃透中央的、主席的，一头吃透情况。最主要是要吃透主席思想那一头。真正对主席的思想有个全面的了解，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大片面性、大偏差我看可以免。因此，我说我们还是对主席的思想系统了解得不够，坚决按着主席的思想办事的信念还不够，我觉得这是最本质的东西，最关键的问题。

一、下最大的决心，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

要下最大的决心，按主席的思想办事，就是要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我加了个“坚持”，坚持很重要，单学习，不坚持不行。不是半心半意地学，而是全心全意地学；不是片言只语地学，而是全面领会，活学活用；不是单号召一般干部学，而是我们领导干部带头学；不是一时坚持，而是始终坚持；不是一事坚持，而是事事坚持；不是

一次坚持，而是反复坚持。这就是豁出去了。学习而不坚持，我看也可以套用主席的话：等于没有学。学，而不坚持，有什么用？持，持而不坚，等于没有持。

学什么？坚持什么？就当前、一个时期来讲，主要的（我不可能讲那么全，凑嘛，三个臭皮匠……，我们这有三百个臭皮匠，大家来凑）是学习和坚持下面六个问题：

1、学习和坚持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他讲：“全国胜利之后，中国还存在两种基本矛盾，第一是国内，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是国外，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主席好几次讲，他说他讲了十几年了，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是回什么事情，思想准备不足。为什么思想准备不足？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不少同志是模糊的（有一个时期我也是模糊的），甚至很糊涂。社会主义社会是要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们许多同志长久弄不清楚，我也是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不是有一个长时期吗？要消灭阶级和三个差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依靠革命的知识分子，依靠革命干部和其他革命分子。团结谁？团结中农同其他的劳动者，其他的爱国者。反对谁？向谁专政？反对已经被打倒的封建阶级，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对我们党的复辟企图。这一段话说矛盾的性质，“二十三条”上谈矛盾的性质，主要的是让我们领导干部（支部以上）必须讨论清楚。

民主革命时期矛盾我们清楚得很，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要使我们广大人民知道社会主义时期，把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这两个口号，要做到家喻户晓。这有伟大的动员作用，使我们全党、全民有个清醒的头脑，清醒的方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势力。这就可以管几十年、百把年。

办法是什么？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主要的办法是什么？我的意见还是主席在第一个“十条”上讲的话：“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新教育、改造人”。这是个很大的理论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提得很高的。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向我们作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处分人的目的是改造社会、改造人。惩办是为改造人、改造社会服务。毛主席在第一个“十条”中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把这些资本主义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包括犯错误的干部、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宣统皇帝。标兵是皇帝）。我们共产党的本事在哪里呢？就是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人，发展生产力。这一条如果我们弄清楚了，我们不是为处分人而处分人、为惩办人而惩办人，是为着改造人，而对有些人必须采取惩办，才能改造得过来。我讲话的意思不是说不要惩办，惩办、处分是为了教育改造他，我们把这个目的、根本政策掌握住，我们就好办了。我们国家的地富反坏右，将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清理出来的坏干部，新旧合起来，一共几千万，你送给谁呀？送给美国约翰逊去？送给修正主义去？我们也送不出去。主席讲，人是最宝贵的财产，人就是劳动力，又是反面教员，留下来，改造。同志们，我讲这个话，你们不要以为以后干部有错误你们不要斗，还是要斗，斗也是为了改造他。有些人那么坏，不斗改造不了。我举个例子，武功薛固街大队支部书记康正逊、大队长陈景玉为首的投机倒把集团，几年来牟取暴利七万五千元，还贪污集体资金一万多元。如果他主动检讨，主动退赔，开那么两、三千人的大会检讨和斗争。对于一部分人用斗的办法、法办的办法，来达到改造的目的。这样我们就站得更高了，看得更远了。

2、我们要学习和坚持主席的哲学思想——辩证唯物论的思想，一分为二的思想。

“二十三条”上第二十二條：“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加以分析。”不要把问题“看成是绝对的，静止的，孤立的，不变的”。任何事情都加以分析。主

席批评的很严，批了两个批语（批徐寅生的那个你们已经看了）。过年那天主席批了一个批语，给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看。“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弃到九霄云外，连一些大老爷也在所不免，现在应该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这些人也沾了个光，看了一下。所以形而上学，不要把自己除外，谁除外就可能犯大错误。还有主席批徐寅生同志的讲话批语讲：“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同志们，这是指参加工作会议的人，我看也泛指我们的老革命、老党员。毛主席讲，霸着茅房不拉屎，这个很明确、很尖锐，也很诚恳。对任何事情都要加以分析，我们可不要搞静止的办法去观察解决问题。一条最好的办法就是领导大家往前看。许多事情，从时间上来讲无非三个：过去、现在、将来。有过去的事，有现在的事，有将来的事。我们要立足于现在，面向将来。过去的事情，有些弄不清楚，我的意思现在停下来，不要争了，因为有些事情讲不清楚。留下来，待历史去解决，恐怕更稳妥。安康民主革命补课不是反复了好几次吗？我主张你们停下来，现在不要争论这个问题，你们要放下心来。安康的土改究竟怎么样，社会主义教育搞完以后，用事实去做结论。否则的话，你们现在提心吊胆，争过来、争过去，将来又要承认错误，又变，这个不好。我在北京听到过一个笑话，有个时期搞了个特务，头上写“特务”两个字，后来一查“不是特务”。后来又一查，“不”字加个“之”，“还”是特务。特务——不是特务——还是特务。你慢一点嘛！有些事情不要匆匆忙忙的。生产上，有些问题上，比方救灾，那你就不能慢腾腾的了。有些事，这个“有些”就要分析。有些事情没把握，有些事情有把握，当快的快，当慢的慢。什么事情可以快，什么事情可以慢，也是两分法，不要孤立、静止地看问题。最重要的是领导大家朝前看，把工作搞好，把生产搞好，这可是一分为二，实际工作上很重要的东西。要求大家把工作搞好，把生产搞好，将功补过，从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这是个最好的办法。我觉得学习主席的哲学思想有两条：一条，什么事情都要加以分析；一条，领导大家往前看。主席的哲学思想很多，但是我觉得重要的、对我们实际工作有巨大意义的是这两点。

3、学习和坚持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我觉得这条很重要。

主席特别讲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搞。就是要依靠省、地、县委的工作队，要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一下子就要把政策交给他们，交给群众、交给干部，要开门见山，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这个是正面讲的。中央就是将“二十三条”印成布告，直接交给群众，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主席讲得很严。主席一月三号有个讲话，他讲现在我们许多人不会搞群众运动。过去我们比较会搞一些，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有个压迫在前面，敌人压迫我们。他说过去几千人、万把人的煤矿，一个党员都没有，有一个就可以闹大革命。粤汉铁路一个党员都没有，可以闹二七大罢工。安源煤矿就去了少奇同志一个人，开始办夜校，办了三个月就闹罢工，反对国民党。我们过去会革命，现在搞这么多人，不会革命了。他说，我的意思一是不要孤零零地去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太多，三是不要那样去扎根串连。一下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没事就散。不是讲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群众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吗？毛主席一九四三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讲的群众路线，一般号召同具体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同广大群众相结合。这就是做群众工作的根本方法。主席抓住了二十个材料，写出了“十条”，抓住大寨，就一般号召；抓住大庆，就一般号召；抓住我们这几个月的成绩缺点、经验教训，搞出个“二十三条”，就是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不只是群众，而是广大群众）。现在我们实际工作上没有解决什么是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个问题。我冒叫一声，我觉得这个问题点上没有解决，面上也没有解决。骨干、积极分子要不要？要，任何时候都要。领导者要依靠那些先进分子，团结、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种作法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只听少数人的话，情况也是他们供的，主意是他们出，事情也是他们办，而把广大群众实际上当成哑巴，当成

阿斗。同志们，我很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我说群众基本上没有发动，少数人包办一切，多数人心惊胆跳，工作组走了以后，要出大危险。主席不赞成这个办法。究竟积极分子干什么事情，起什么作用，广大群众起什么作用，我觉得要重新研究这个问题。主席是不主张开小会的，他觉得一个生产队开会，群众脸皮扯不破，他主张几个生产队联合起来，一次解决一个问题、或者两个问题。要宣布政策，打通思想。积极分子你可以领头讲话，他讲了，你就可以问大家：同志们！你们赞不赞成他讲的？群众里面有公道的，如果他讲赞成了，但是吓得发抖，那你就考虑考虑，那是假赞成；如果“这个讲得好，赞成！”那是真赞成。你工作组要站在旁边观察，就是调查研究，观察中有分析。有些积极分子是假积极分子，可害人哩，“我说这个，你们说是不是？”他吓唬群众，群众躲着你讲“对”、“对”，这还不应该引起你的注意？你可不能上当啊！有的群众就高高兴兴，是真赞成，“那个老汉讲得好！讲的我们的心里话，我赞成”，那就可靠了。所以，究竟积极分子，领导骨干怎么同广大群众相结合，我觉得还没解决。二、三年来，我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交心的话，我很担心我们现在的方法不行。我担心我们这样做，可以把好积极分子也搞坏，搞得他们包办一切，他们将来又办坏事，把风也带坏了。他们不晓得走群众路线。我们不晓得使领导人、骨干分子同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个问题我很有意见。我今天讲话，带点情绪。我提议，我们的地委、县委，首先是省委，注意很好地研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讲出一番道理来。现在我讲不清楚。但是，我考察的现在有的做法是埋下了炸弹。这不是什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积极分子怎么同广大群众结合，他怎么搞民主，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主？积极分子不是高高站在群众的头上，而是要按毛主席说的，站在群众中间，代表群众的意见，不能给积极分子特权。我觉得我们有些地区历史上发动群众的经验，是不足为训的。我也可能讲冒了。就是不是主席的方法。我觉得县委以上的同志在一个时期内要研究这个问题，如果研究得不好，将来四清、评审阶级，对干部都会处理不好。我的意见，按照毛主席的办法，经过调查，经过研究，经过交换意见，要交代政策，反复交代。一个大队就几十个干部。“社员同志们，你们觉得你们大队这五十个干部谁最好？”头一天开会就讲这个，可能不做声。“你们不做声？党中央讲的，毛主席讲的，干部有四种，一种好的，一种比较好的，一种问题多的，一种性质严重的。分四种你们赞不赞成？”社员就考虑了。“毛主席讲的对，可以分四种。”但谁是好的，他可能不讲，不讲那就散会。过了几天又开会，“你们想通了没有啊？谁是好的？”可能有人讲了，张三好的，“你们赞不赞成？”如果大家一下就鼓掌，那确实是好的。同志们，我们群众路线怎么走，评审阶级怎么评审，我的意见不要造紧张空气，把大家找来，你是中农，你可以不划了，平心静气，你必须补划，为什么你补划？你干了什么什么事，但你将来还可以去掉。我声明，我现在讲不清楚。我总觉得我们要把群众路线走好，按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我觉得四清可以搞得好的，全部审定阶级也搞得好的。谁可以补划，谁可以不补划？四类干部怎么分法？有的同志要我们划个杠杠。好的什么标准，比较好的什么标准，问题多的什么标准？同志们，这个杠杠我们不能划，谁也划不好。划了杠杠你无非是拿几条杠杠去套，把群众的手捆起来，“你赞不赞成？”他假赞成。我就这四个大杠杠，你们比较，大家比较，大家同意，大家办，错了大家负责。所以有些杠杠不能划，为什么反对烦琐哲学？因为它把正确的事，办成坏事。还是要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我讲不清楚啊。

摆事实，讲道理，严禁打人，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做法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有人说群众赞成打人，我不相信。某些人主张打，多数人可能不主张打。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是土包子，因为我也搞过两年半土改。土改时我们也看过很多人诉苦，诉恶霸的苦，说“不是党的政策，不是毛主席的话，我就要揍你呀！”他还是缩回去了，他不敢打。你把政策交给他了嘛！有了政策，大多数群众是懂理的。土改时我亲自参加过许多这样的斗争会，我看到过许多这样的事。所以，说全体群众都主张打人，我不相信。说禁止了打人就泼了群众的冷水呀！我觉得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反对群众打人，反对群众体罚，就脱离了群众，

我觉得这是形式主义的观点。我不赞成这个逻辑。有许多生动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什么叫威力？产生这么一个问题。我说真正的威力，是用毛主席思想，党中央政策武装了群众，真正按照中央政策办事的群众运动，才是威力。按毛主席思想、党的政策，摆事实，讲道理，是最大的威力。我们的“九评”，我看比原子弹威力大得多。吓人、骂人、打人、抓些人，拿绳子捆得紧紧的，那是什么威力呀？表示你害怕他。一个犯人你把他捆起来就算了，还要捆得死死的肉都捆烂了，还得给药治。同志们，有些老头子，他就站在旁边看着咧，啊哟！人民政府捆人哩，捆这么厉害啊！他先不从阶级分析出发呀！同志们，我们这些东西以后都不要。毛主席亲自领导公安部门，对犯人不要虐待嘛。我们党讲原子弹都是纸老虎嘛，你那个打人不叫纸老虎，叫什么老虎？我说纸老虎也算不了，算纸蚂蚁。我的这个话你们不要去传，这是个形象的说法。我们群众路线不是这个。什么叫声势？政策就是声势，马克思主义就是声势，别的都是纸老虎，都是没有作用的东西，都是许多群众不同情的东西，或者大部分群众不同情这些东西。摆事实，讲道理，就是威力，“二十三条”就是最大的威力。

4、学习和坚持毛主席的民主作风，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来保证它。

这个问题，“二十三条”的二十条讲四大民主，“学习解放军，实行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二十一条讲工作态度，“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家把自己的话说完。”主席十二月二十八号同我们讲了一通，讲得非常厉害，我把这一段向你们说一说。他说：工作态度，就是要讲点民主。有些同志天天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些同志只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军队老早就有三大民主，有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他说，为什么要军事民主呢？就是我们遇到了困难，碉堡打不开。中央苏区有次一个碉堡打了半年没有打开，他就找了一些班长、排长来谈，排长、班长就给他讲意见，所以他对这有深刻的印象。按照他们的办法一搞，后来碉堡就打开了。就是没有做瓦解工作，碉堡里面的人害怕全部杀头。主席不是讲好话坏话都要听吗？他一边念文件一边讲，他说：好话爱听，这个不成问题，问题就是坏话不愿意听。陈毅元帅插了一句话，他说听坏话不好受。主席又说，那一年七千人大会，我就讲过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他说不是下级的干部不好摸，而是我们这些人更不好摸。老党员哪，老资格呀，疮疤揭不得呀。他又念文件：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他一边念一边解释，他说这个比较困难。他说，这没有关系嘛，你听嘛，听人家讲完嘛！他说，世界上有一种人专门训人，不是对话式、交谈式，而是训话式。他说，我历来主张讲话一不要鼓掌，二不爱听就可以打瞌睡。我讲话你鼓掌，你打扰了我的思想嘛！至于你讲得好不好，人家不愿意听，还是保养精神好嘛。他说，我们还有一种人，在同志中间使人害怕。在同志中不要那么凶。他说，凡是使人害怕的人，大概他手上的道理不多。他说，过去我们军队里面有些连长，他不讲民主，他只有三条办法：一是骂人，二是打人，三是关禁闭。他除了这三条办法，就没有别的办法，没有说服的办法。他说，还有个对待逃兵的问题，逃跑了就算了嘛，过去有的地方硬要捉回来，有的捉回来还要枪毙。他说，真是岂有此理！人家为什么要逃哩？就是受不了你这个气嘛，在你这里混不下去了嘛，他没有兴趣嘛。他说，逃兵一不要捉，二不要枪毙。他说，捉回来也可以咧，但不要枪毙。还要向他承认错误，请他吃饭，给他吃猪肉。如果他吃了猪肉还要逃，他讲也可以。不逃了，你就呆下来。用骂人的办法，打人的办法，捉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反正是他积极性不高。他这个地方讲的兵，讲的贫下中农的咧，因为过去当兵的都是贫下中农，雇农嘛，是阶级兄弟嘛，这个地方你们就要把它分析一下，不是对坏干部不要了，是讲阶级兄弟嘛。同志们，讲民主，听反面的话，这一段我觉得非常重要。

能不能听进去坏话，错误的话，反对的话？现在不是提倡过硬吗？民主要过硬啊！军队打仗得过硬。我说我们陕西的党，能否听坏话、反对的话，就是民主能不能过得硬。军队不

叫做硬工夫吗，要有过硬的本领。在接班人的五条上，不是讲了这个吗？要学会作善于同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我这一条很差，现在跑来当代理第一书记，“湖南蛮子”有名的，讲话粗粗的，嗓子那么大，我看也是个纸老虎就是了，你们以后就把我当成一个纸老虎，不对就向我提意见嘛。我这一条还是可以的。这个人爱跑，到处转，县上、哪个地方都要转的。有问题提嘛，不怕，怕什么，抓住真理嘛。在这，附带讲了一下我这个人的毛病。

5、学习和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的的思想。

你不是为人民服务，你损害人民的利益，反党，走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蜕化变质，做官当老爷，我非反对你不行。同志们，这个不能马马虎虎。我看要设法惩治，坚决反对，批评、斗争，含糊了要吃亏。有些事上面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了，要你办这个事情，你拖了三个月还不办，那还能行啊！那不行。你做官当老爷，讲话自己不准，秘书写稿，匆匆忙忙拿上去，丢了一页没有带，还给秘书发脾气“你怎么搞的！”你做官当老爷，到了这个程度也可怕了吧！同志们，陶铸同志在北京讲了个笑话，他说，一个人念他的报告稿，把改良“土壤”念成改良“土坏”，把“才子佳人”念成“才子住人”，念不下去了，说这个稿子写得不好。同志们，这样做官当老爷，怎么能行！你文化低，不要紧，先准备一下嘛，也可以找人帮助嘛。我们这个省有没有？有了就得要“将军”，那样马马虎虎还行哪！

原则性问题，要抓住，不要害怕，当讲什么，那不能来自自由主义，当讲则讲，当批评则批评，当揭露则揭露，当斗则斗，该撤的撤。但是，要搞灵活性。小问题，要原谅，不要斤斤计较了。他改正了就要宽大处理。他在组织范围内讲的话，叫“三不”主义喽，讲错了也不要处分，也不要抓辫子。他在党的委员会上讲的话嘛，你就不要处分他，是小问题嘛！他积极改正了嘛，那就允许人家改正嘛。这个就得灵活性了。

这里牵扯到我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我们将来民主革命补课，怎么补法？不是说我们民主革命不彻底吗？将来究竟补划多少？我的意见，坚决执行“二十三条”，就是十几年来老实劳动的，没有作坏事情的，不要补划了。补划的量，以县为单位，决不要超过百分之六、七、八。毛主席讲：“树敌太多，对人民不利。”请你们记住主席在这次会上讲的这个话。（守一志：剥削人口讲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除过他的子女）那是呀，讲他本人。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分个轻重缓急。你们不是说面上人太少吗？你们在小组会上有强烈的反映和要求，我说要抽回一些人去面上工作。有些事情要当机立断，有些事情要从容处理，这个都是多谋善断，当机立断，从容处理，都要区别情况。这些都是主席的思想。

6、学习和坚持主席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指导思想。

拿到我们工作上来说，拿这个思想来对待我们今年的工作，对待明年的工作，我主张在战略上采取乐观主义，战术上面扎扎实实，一抓到底，抓住不放。扎扎实实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我们的生产今年能不能搞得更好？现在向我们陕西全党提出这么个问题：是悲观，还是乐观？工业生产也好，农业生产也好，文教也好，财经也好，我主张是乐观的。搞点乐观主义。因为条件好。第一，有“二十三条”，第二，中央准备支持我们两件事情：一个是多给我们几万吨化肥（已经答应给三万吨，加上西北局分配的八千吨，一共三万八千吨）。另一个是中央今年准备减少我们点负担，征的任务不减了，购的任务减。我们去年全省产量八十六亿斤（守一同志：现在又长了，八十七亿五），是不是？啊！不要满打满算，我赞成八十六亿，因为人家留点余地，我们留点也好嘛，八十六亿，征购了十七亿。省委已向中央写了报告，今年我们只征购十三亿。去年我们确实有灾，七十五天下雨。我说三条：化肥增产三亿，减掉我们负担四亿，天气如果正常，增产四亿，加上我们鼓足干劲，再搞三亿，八十六亿加十亿，不是九十六亿嘛，再少征购四亿。十四亿，一千八百万农村人口，平均口粮多得了八十斤。多得了八十斤口粮，猪子发展不起来？冬天修水利没有劲？造林就容易了嘛。一个抓粮食，一个抓棉花。同志们，棉花一抓，假设我们努力搞到二百万担，就比去年增产四十万担，正产品、副产品就是四千万元钱。四千万元钱买肥料呀，今年冬天分配

呀，我看心情舒畅，或者心情比较舒畅。总之，在战略上应该是乐观的，条件换了嘛，“二十三条”，中央的支持，西北局的领导，还有，干部又回去一些。悲观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毛主席刚讲了“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你还悲观哪？我主张你们县委的同志回去讲话要挺起腰杆，纵观全局，今年相当有把握，有希望。主席经常讲这三句话：“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同志们，消极话不能讲得太多呀！我同意守一同志的意见，消极话讲得太多了，你的头低一寸，他的头就低一尺。我的意见，有中央的政策、中央的领导，有过去的基础，我觉得今年我们有条件争取一个好收成。这是我们从战略上讲。

从战术上讲，我们谨谨慎慎，扎扎实实，要多谋善断，要多酝酿，要抓住几个主要关键，把今年的生产，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打上去。关键有几个？请你们考虑考虑，我说不清楚，但是有这么几条，我首先提个纲。

第一条，号召我们干部参加生产，熟悉生产，领导生产。除了老弱病残，大家都去参加生产、研究生产、领导生产。工厂里边就是这样的。参加生产的调子不要太高，一天参加两小时也好。你只有参加生产、研究生产，才能领导生产。

第二条，继续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省上要开贫下中农代表会，我主张各个县今年夏天再开第二次，扩大的，号召贫下中农带头搞生产。你不说开了一次吗，再开第二次嘛。可以以公社、以县为单位再开第二次，再开扩大一点嘛，（守一同志：吸收一点中农里边的积极分子也可以）开劳模会也可以嘛。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号召他们带头搞生产。妨害生产的坏人坏事，也可以揭一揭。

第三条，号召有错误的干部将功补过，号召好干部功上加功。

第四条，及时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表扬先进。生产搞得好的要树标兵，比、学、赶、帮。哪有那么多假劳模？有假劳模，有真劳模，劳模是客观存在。还有许多新劳模，把它调查出来。哪一个公社搞得好的，哪一个生产队搞得好的，要登报，及时表扬先进。学习呀，必要的现场会要开，扎扎实实的现场会要开。

第五条，要有计划地提拔和交流一批干部。提拔一些扎扎实实，朝气蓬勃的革命干部。我的意见，这条要公开讲，交流一批干部，提拔一批干部。你不早讲，他没有思想准备。交流干部，提拔干部，也是主席在这次工作会议上反复讲了的。这个不要含糊。我的意见，越讲的早越好。主席讲，我是湖南人，开始在湖南革命，以后蒋介石一赶就赶到陕北，胡宗南一来，我又搬家，就搬到北京。他说，同志们哪，哪里不可以革命嘛。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只愿意在本县革命，不愿到别县去，这个不好。思想要打通。我主张我们的干部，将来到南方（有些干部，不是所有的干部都去）。到马克思那里他问你到过南方没有？你说没有，我就是个北方人，人家会说你为什么地方观念那么重。大丈夫嘛，四海为家，开阔眼界。我这个人到处流窜。陕西出了个李闯王，他到处闯，走了多少地方，好得很嘛。那个人，开始是有本事的。我们连李闯王都不如啊！他一不是共产党，二不是民主人士，他就敢闯。我觉得这个好。我觉得交流干部，还要提拔一批那些朝气蓬勃的。这一条不能动摇。我说不是再树一个标兵吗？韩城的那个是不是，说搞得比较好嘛，说就是骄傲一些。骄傲一点，他有点本事嘛，就让他骄傲一下嘛。我说，对骄傲也是两分法。同志们，咱们应该同他打个招呼喽，他有点本事才能够骄傲嘛。真有本事的人不骄傲。满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满瓶醋，不晃荡，一点醋也没有，它就不响，“一穷二白”嘛。这也是两分法。同志们，有本事这一条不要轻视。现在这个问题上，某些地方可能有点苗头，有点偏差。

最后一条，就是我们要在党的、毛主席思想底下，搞好工作的原则底下，在这个大前提下，团结起来，全党一股劲，团结起来。什么个人意气，什么不同意见，不要紧嘛。有小意见，有争端不要紧嘛。在搞好工作，争取今年的大丰收，在这个大的前提底下，在人民利益的原则底下，团结起来，个人有些意见，有些争端，是不可免的，但是，不能妨害团结。

这个问题，我没有仔细讲，因为时间不多。搞好今年的工作，我提的比较空洞。我讲的就这么些，完了。

荐文说明

白磊

差不多九年前，也就是2004年，我因为要给外公白瑞生编辑一本怀念文集，采访了很多人，这些人大多是我外公当年在陕西工作的领导、同事以及朋友。林牧先生就是其中被采访的一位主要人物，因为外公当年担任陕西省委副秘书长时，林牧先生也任陕西省委副秘书长（似乎还兼着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秘书，或是省委研究室的副主任）。林牧先生记忆力好，思想超前，文笔犀利，自然成为我经常采访的对象之一。当问及1964年到1965年胡耀邦在陕西工作的详细情况，以及与当时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矛盾发生经过时，林牧先生从书房中取出两大本打印书稿，嘱我详细阅读。这两大本打印的书稿详细记录了1964年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病重后，中央委派胡耀邦到陕接替工作，自1964年11月30日就任至1965年6月20日离开西安的整个过程。其中包括胡耀邦在不同场合的讲话，给中央的汇报、报告提纲，以及后期西北局、陕西省委揭批胡耀邦的会议记录、发言以及胡耀邦的辩解和检讨，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记录。

胡耀邦共在陕西202天，其中工作100天，受批判100天。他在工作期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宣传群众，敢于大胆发表意见，敢于大刀阔斧、拼命地做工作，把“知天命”的年华、智慧、精力、才干全部奉献出来，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政策、新办法、新措施，创造性地贯彻了中央的方针指示。当时的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却认为胡耀邦“右倾”，在安康等地所发出的《电话通讯》中所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在接下来的日子，西北局批判他的调子越来越高，先后迫使胡耀邦做了五次检讨，内容从检讨《电话通讯》逐步扩大到胡耀邦到陕西以来的“工作错误”。1965年3月，西北局要求将胡耀邦在写避暑会议上的第五次检讨报送中央，并加发陕西全省各市、地、县委，进一步将批判胡耀邦的情况公开化。胡耀邦被批得大脑蛛网膜炎病发，住进医院治疗两个月，出院后，刘澜涛仍不肯放过，继续组织省委六月工作会议，扩大范围批判胡耀邦。当时叶剑英和张爱萍来陕考察军事工作，看到面容憔悴的胡耀邦，叶剑英私下询问他：“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整人呐！怎么回事？”胡耀邦扼要叙述了一下经过，说“我已经作了六次检讨，还说我认识不上去，通不过。”叶剑英说：“认识不上去就不认识了，通不过就不检讨了。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说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剑英说：“我带你走。”1965年6月20日，胡耀邦同叶剑英一行，乘飞机返回了北京。胡耀邦离开陕西后，批判继续升温，陕西将原有的“彭（德怀）、高（岗）、习（仲勋）黑线”划为西北问题的黑根子，具体又整出了“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将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支持他们观点的一批干部打成“黑帮”，在文革初期时就被以“文化大革命文教系统干部学习班”的名义秘密关押，改名换姓，要揭发和批判自己和所熟悉的人的“反党言论”。

这段惊心动魄而鲜为人知的历史，后来被有心人记录，根据当年的各类历史资料，写成了《自古英才多磨难——胡耀邦在陕西工作纪实》，并将这部书稿的打印稿送给林牧先生审阅，我有缘得到一套，拜读之后深感这部书稿的珍贵，于是推荐给《往事》，希望通过《往事》，使得更多人能知道这段历史。

2012年5月17日